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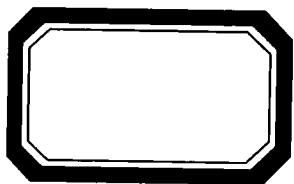
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

“类解”类文献中的 汉—朝词汇研究

金哲俊 著



人民出版社



▶ 朝鲜—韩国学研

“类解”类文献中的 汉—朝词汇研究

金哲俊 著

●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侯俊智
装帧设计:语丝设计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类解”类文献中的汉一朝词汇研究/金哲俊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

ISBN 978-7-01-010921-3

I. ①类… II. ①金… III. ①朝鲜语-词汇-研究②汉语-词汇-研究
IV. ①H553②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9430 号

“类解”类文献中的汉一朝词汇研究

LEIJIE LEI WENXIAN ZHONG DE HAN CHAO CIHUI YANJIU

金哲俊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45 千字

ISBN 978-7-01-010921-3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序

“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即将出版，作为延边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之一，这套丛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朝鲜—韩国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延边大学是一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综合型大学，朝鲜—韩国语言文学学科自延边大学成立之初，担负起本科教学及科学研究的重任。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该学科已是延边大学的领头学科，1994年被评为吉林省重点学科，2002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随着中日、中韩建交，中国与韩国、朝鲜、日本等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发展，国内外朝鲜—韩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优势日益明显，具体例证为延边大学“211工程”一期、二期、三期建设取得的研究成果。

季羨林先生曾提出“朝鲜—韩国学”是“研究与朝鲜半岛相关的各领域的学问，这是不仅包括地理、人种、语言等，还包含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是内涵非常丰富的一门学问”。

“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由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语言文学学科几位教授和学者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选取精髓部分编撰而成。收录到该丛书中的五个研究成果中，四个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另外一个韩国韩国学研究中心项目，受到延边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大力支持。

金永寿的《中国朝鲜语规范原则与规范细则研究》，以基本的语言规范化理论为基础，以科学性、政策性、稳妥性、经济性等语言规范化原则为指导方针，回顾中国朝鲜语规范化的历史，比较中国朝鲜语规范原则与朝鲜文化语、韩国语规范原则之间的异同，探讨了中世纪朝鲜语及现代朝鲜语语法术语的使用问题，该成果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规范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金光洙的《中朝韩日英生物学术语对译词典》，调查和分析对应于英语的生物学用语的实际情况，试图摸索其规范化和标准化方案，构筑了英语—韩语—朝鲜语—汉语—日语生物学用语对译目录。该研究将对东北亚的生物学研究及生物学用语的规范化和普及，乃至其他科技术语的规范化、统一及普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金哲俊的《“类解”类文献中的汉—朝词汇研究》，以历史语言学理论和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归纳和分析 19 世纪末在朝鲜刊行的“类解”类文献，从词汇的角度重点研究汉字词汇和朝鲜语汉字词的使用状况，调查个别汉字词的变化过程以及不同年代的汉字词的使用状况。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朝鲜语言词汇体系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汉语的词汇史研究。

郑日男的《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考证了楚辞传到朝鲜的大致时间，简要介绍了朝鲜各个时期文人学者接受楚辞的基本情况，最后综合考察朝鲜古代文人的楚辞观、接受楚辞的基本动因等。其研究结果有助于客观地把握楚辞在朝鲜的传播、接受与转化特点，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提供了另类事例，对于我国楚辞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李逢雨的《中国朝鲜族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对中国朝鲜族新闻事业的历史变迁和发展状况进行了历史考察，论证了中国朝鲜族新闻出版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该成果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朝鲜文报刊杂志应该切实植入社会效益概念，

通过结构调整和资源重组的规模化经营，对各种读者市场的开发、培育以及差别化经营管理来发挥自己的特色。

“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不仅涵盖了朝鲜—韩国语言、文学、文化领域的研究，还包括了朝鲜—韩国语言文化与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各国语言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能够取得重要成果，是延边大学的地缘、语言、文化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

“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的出版目的在于，和国内外广大学者、教授、研究者等学界同仁一同交流这些研究成果，虚心接受批评，弥补我校的缺点，进一步突出我校的优势，从而形成我校自己的特点。再者，通过与学界同仁们的交流和研究，不断扩展视野、积累经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共同促进朝鲜—韩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正如所见，“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充分体现了延边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中朝鲜—韩国语言文学学科所取得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将成为即将开始的延边大学“211工程”四期建设项目的坚实基础。

最后，向为这套丛书顺利出版提供支持的人民出版社以及相关同志表示深深谢意。

延边大学 蔡美花

2012年2月10日

前 言

朝鲜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学习外国语。1276年，朝鲜高丽王朝设置了“同文馆”（后来改称为“司译院”），该机构专门用来培养外语人才。1392年建立的李氏王朝继续沿用了“司译院”这一名称。朝鲜设立“司译院”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学习汉语并开展与中国之间的外交。之后，随着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除汉语外，还先后设立“四学”即“汉学”（1393）、“蒙学”（1394）、“倭学”（1415）、“女真学”（1426）。1667年，“女真学”改称为“清学”。

“四学”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有《译语类解》（1690）、《同文类解》（1748）、《蒙语类解》（1768）、《倭语类解》（1780）¹。这些文献将汉语、满语、蒙语、日语与朝鲜语对译起来。所谓“类解”，即把词汇分类成天文、时令、地理等几十个类别之后，逐次解释其义的意思。这不仅是有有关学习外国语的既简明而又饶有兴趣的词汇集，同时还具有对译著述的性质。

上述“类解”类文献刊行于近代朝鲜语初期的100余年间。它们之间的比较研究有助于语言的历史研究。近代朝鲜语时期的朝鲜语词汇体系和词汇、汉字词汇和汉字音的变化、当时的汉语、日语、蒙语与朝鲜语的比较、三国之间的语言关系等都成为其研究的对象。

“类解”类文献不仅对朝鲜语学者，而且对汉语学者、日语学者、蒙语学者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史料。

到目前为止，“类解”类文献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大都为个别文献的研究，整个“类解”类文献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并不多。其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书志学(图书学)研究;二是朝鲜语(韩国语)学研究;三是外语研究。

安田章(1967)试图通过“类解”类文献的分类、标题语、题材等比较,研究其相关关系。

郑光(1978)从文献学(图书学)角度出发,在研究四部“类解”类文献的基础上,比较各部门之间的分类与体系,考察撰写体系。

李喆鍾(1983)、安鍾福(1986)比较研究“类解”类文献的标记法、音韵、词汇,研究标记法的变化研究。

严奎东以“类解”类文献中心查明此词汇集的特点与相互关系,考察近代朝鲜语词汇体系的特点。

李基文(1974)、洪允杓(1995)、严奎东(1995)解题《译语类解》,研究现存的各种异本。

沈在箕(1991)以《译语类解》标题语为中心,调查研究近代朝鲜语的词汇体系。

福田和展(1989)通过以《上全》为形式标记的词汇,研究汉语的同义词。

成百仁(1994)、金成禧(1993)、严奎东(1995)综合了包括《同文类解》在内的现存青学书的全部研究成果,通过《同文类解》与《蒙语类解》的比较,研究两个文献的标记法和形态及其词汇,以标题语为重点,比较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赵健相(1968, 1971)专门研究《同文类解》的标记法、音韵、语法、词汇。

朴恩用(1968, 1970)从语法角度出发,研究语录解的满语及其出刊,金東昭(1982)专门研究满语词汇。

宋基中(1985)以《蒙语类解》为中心,简单描写“类解”类文献的汉语及其朝鲜语的特点,研究蒙语的撰写体系。

郑光(1990)研究包括《蒙语类解》在内的蒙学三书的重刊。

辛美英(1979)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研究以《蒙语类解》的朝鲜语对译词为中心的标记、音韵、词汇、语法现象。

郑堤文(1989, 1991)研究《蒙语类解》的圆唇音的分布及朝鲜所研究的蒙学成果。

浜田敦(1957)、宋敏(1968)、安田章(1986)、郑光(1988)等解释或介绍《倭

语类解》，讨论其刊行年代，进行综合性研究。

李晶洙(1982)研究包括《倭语类解》在内的倭学书的日本语的朝语撰写标记。

以上先行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足：

一、现存诸异本之间的关系、“类解”类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仍有待于研究。

二、以“类解”类文献作为词汇资料的研究不够。到目前为止，研究只集中于标记法与语音。

三、对于某一种语言的研究还需进一步详细。尤其是考虑“类解”类文献的汉字标题语的研究成果不够多。同时，对汉字词汇的研究和基于标记法的朝鲜语形态变化的研究成果也并不多。

在此情况下，本课题主要研究目的在于弄清楚上述“类解”类文献的性质与相互关系，通过研究标题语和解释词的词汇体系，进一步研究汉字词汇地位、使用状况及朝鲜语词汇。

本课题研究意义在于以在朝鲜刊行的“类解”类文献里出现的朝—汉词汇为研究对象，研究朝鲜语词汇，着重研究汉字词汇。该研究有助于研究朝鲜语词汇史与汉语词汇史。

该研究由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由6个部分组成。

第一，“类解”类汉字词汇研究。从近代朝鲜语体系是固有词和汉字词的二重体系的角度出发，主要通过“类解”类文献的编辑关系，着重研究汉字词汇地位、汉字和朝鲜语、满语、蒙古语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流入朝鲜、满州、蒙古的状况、在词的构成成分和词的构成方法上考察“类解”类文献的汉语词汇与语义关系、朝鲜语词汇体系中的汉字的地位等。

第二，《译语类解》的汉语词汇分类与词汇场以及构词特点。通过《译语类解》的汉语词汇，着重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词汇分类与词汇场以及近代汉语的双音节和三音节词汇的构词特点。

第三，“类解”类朝鲜语词汇研究。着重研究朝鲜语词汇的形态变化与朝鲜语词汇的变化状况。

第四，研究《华语类抄》词汇体系。《华语类抄》是19世纪末编撰的与“类

解”类文献相似的词汇集。其与其他“类解”类文献相距约有100年。《华语类抄》词汇体系的研究有助于其他“类解”类文献的研究。

第五，着重研究了《华语类抄》的朝鲜语词汇变化。

第六，《女真译语》与《同文类解》的词汇比较。

第二部分是“类解”类文献的汉一朝词汇对应及国际音标撰写手册。

整理包括汉字标题语在内的“类解”类的全部词汇，编辑“类解”类词汇集。

由于与汉字标题语对应的解释词是朝鲜语，因此，对中国学者来说，研究在朝鲜刊行的对应文献还存在一定难度。因此，用国际音标来标记全部的朝鲜语解释词，这样一来，朝鲜族与汉族学者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朝鲜刊行的对应文献。

本书收入的内容为第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书后附有“对应于同一个解释词的汉语词条”和“《译语类解》汉语词汇”两项内容。

注释：

1. 本课题研究所用的《译语类解》、《蒙语类解》、《倭语类解》、《译语类解补》是汉城亚细亚文化社影印的汉城大学中央图书馆古图书本。《同文类解》是韩国延禧大学校东方学研究所影印的汉城大学奎章阁藏书本。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类解”类汉语词汇研究

第一节 在“类解”类文献里所体现的汉语词汇的地位及接受情况	5
1. 从三个文献的编撰关系及特点的角度分析当时汉语的地位	6
2. 从解释词的角度分析当时借用看汉语词汇的情况	10
3. 朝、满、蒙三国语言之间的关系	12
第二节 “类解”类文献的汉语词汇与语义关系	26
第三节 “类解”类词汇体系中所反映的汉语词汇地位	38
1. 与词条同一的解释词	39
2. 以“- - ㄱㅏ [heta]”形式标记的解释词	40
3. 以与汉语词条不同的汉字标记的解释词	42
4. 以与汉语词条不同的汉字 + 朝鲜语或朝鲜语 + 与汉语词条 不同的汉字标记的解释词	44
5. 以“- - 朝鲜语固有语”形式标记的解释词	45
6. 以与词条汉语不同的汉字 + [hata] 形式标记的解释词	46
7. 以“上全”形式标记的解释词	48

第二章 《译语类解》的汉语词汇分类与词汇场以及构词特点

第一节 《译语类解》的汉语词汇分类与词汇场	51
1. “天”和“地”词汇场	53
2. “人”的词汇场	53
第二节 《译语类解》的汉语词汇构词特点	63
1. 《译语类解》的汉语词汇词法构成特点	64
2. 《译语类解》的汉语词汇句法构成特点	69
3. 《译语类解》三音节汉语词汇的构词特点	70

第三章 “类解”类朝鲜语词汇研究

第一节 因标记法的变化而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74
1. 因上缀和下缀标记法而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74
2. 因复缀标记而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75
第二节 因辅音变化而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76
1. 因紧音化而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76
2. 因腭化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80
3. 因送气音化而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83
第三节 因元音变化而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84
1. 因“· [e]”的消失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84
2. 因圆唇元音化而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86
3. 因阴性元音化而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91
4. 因单元音化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93
第四节 因音节的添加和脱落而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95
第五节 因尾音变化而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98

第四章 《华语类抄》词汇体系研究

第一节 文献考证	104
第二节 《华语类抄》词汇体系研究	106
1. 对译汉语词条的解释词研究	106
2. 外来语研究	112

第五章 《华语类抄》的朝鲜语词汇变化研究

第一节 词汇的外形变化	116
1. 因音节的增减引起的外形变化	116
2. 因语音变化而引起的词汇外形变化	124
第二节 词汇的交替	133
1. 《华语类抄 1》中被交替的词汇	133
2. 《华语类抄 2》中被交替的词汇	134
3. 《华语类抄 1、2》之后被交替的词汇	134

第六章 《同文类解》与《女真译语》的词汇比较

第一节 《同文类解》与《女真译语》词汇对照	140
第二节 《同文类解》的满语与《女真译语》比较	156
1. 《同文类解》的满语与《女真译语》基本相同的约达 60%	156
2. 《同文类解》的满语与《女真译语》相近的约 23%	157
3. 《同文类解》的满语与《女真译语》不同之处约占 16%	165
4. 汉语与朝鲜语记录其他语言(女真语或满语)的不同之处	170

附录：

一、对应于同一个解释词的汉语词条	173
二、《译语类解》汉语词汇	206
参考文献	237
后 记	241

第一章

“类解”类汉语词汇研究

众所周知，在现代朝鲜语词汇体系中，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功能上汉字词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众多文献里出现的汉字词却没能得以重视。在此情况下，整理古文献的汉字词，在其基础上仔细调查个别汉字词的变化过程，正确理解汉字词的使用情况在朝鲜语词汇史研究方面则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与朝鲜语解释词对应的两个以上的汉字标题语，从共时的角度出发，可研究汉语的变化情况。即汉语使用变化不仅可通过中国的诸文献进行研究，也可以通过在朝鲜编撰的古文献进行研究。

“类解”类文献中汉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本课题并行研究汉语词汇。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缘故，朝鲜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汉语，尤其是李氏朝代，朝鲜学者对中国明清时期的汉语音韵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们留存下来的诸多文献，对研究近代汉语不失为宝贵的音韵史资料。

1392年，李成桂推翻了高丽王朝，建立了李氏王朝。李氏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加强与其邻国之间的频繁交往。除与中国明朝以外，李氏王朝还与日本、蒙古、女真等建有邻国关系。其中与明朝的邻国关系是李氏王朝发展经济、安定政治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李氏王朝从建立之初就设置了规模庞大的汉语翻译机构，积极培养汉语翻译人才。

据《太祖实录》，1393年李氏王朝设置了司译院。“司译院”这一个名称是高丽通文馆末期产生的，太祖沿用了旧名。它是传授汉语并培养翻译人才的国家行政机构，设置其目的在于“置司译院，肄习华言”。（《太祖实录》二年九

月辛酉)“本朝有司译院,专掌事大交邻之事。”(《通文馆志》肃宗四十六年刊)类似的记录很多,如《成宗实录》卷六十七成宗七年丁巳五月条载:“我国邈在海表,与中国语音殊异而朝聘贡献往来陆续,以为译学不可以不重。故设司译院,以专其事。”这就证明它首先是为跟明朝的交往而设的。以后司译院掌管事务也扩大到“掌译诸方言语”(《经国大典》卷一)。于1411年设四学,即汉学、蒙学、倭学、女真学。

司译院里安排了汉学教授从六品四员(二员文臣兼),汉学训导正九品四员,蒙学女真学训导正九品各二员。虽然后来人数有所变化,但是汉学教授和训导人数始终居多。

司译院旨在培养以汉朝翻译为主的各类翻译。这一点可从太祖三年十一月,司译院提调契长寿的建议中可以明确看出。

又据《经国大典》、《世宗实录》、《鲁山君日记》记载,除了中央的司译院教授、训导以外,在地方上也分配了汉学训导。15世纪至17世纪,朝鲜先后在黄州、平壤、义州、海州、长渊、经营、济州、殷栗、铁山、瓮津、宣川、江界、定州、安州等地配置了“译学训导”,其旨为讲授汉语,培养“乡通事”(指地方翻译)。

设司译院之前,李太祖元年八月,在科举法里,除已有的各科外,还新增设了译科。译科汉学考试内容大致如下:

(1)讲书:临文《四书》;背讲《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说》

(2)写字

(3)译语:临文《经国大典》

到了18世纪,背讲科目中,用《五伦全备》替代《直解小说》,19世纪又用《译语类解》替代《无论全备》,除此以外别无变化。除《译语类解》外,这些书都是汉语课本,其中《老乞大》、《朴通事》则是从高丽时期流传下来的汉语会话课本。

通过考试,及第一等为从七品官,二等为从八品官,三等为从九品官。被录取者或当司译院官吏,或当地方译学训导,或当通事。通事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又分为堂上译官和堂下译官。

译科考试层次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在汉城和地方、复试在汉城分别进行。初试的汉城试中,汉学占二十三人;地方试的汉学考试中,黄海道七人,

平安道十五人。复试汉学十三人。初试的汉城试由司译院掌管，地方试由该道观察使制定专人掌管。复试汉城试由礼曹司宪府、司谏院、司译院共同掌管。译科科举一般跟文科一样三年举行一次。

李氏王朝历代诸王，除了通过司译院掌管汉学以外，又亲自采取各项措施，维护汉学的发展。

世宗(1419—1450年)曾向明朝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要求，但遭到明朝拒绝。于是他便设想“遣弟子于义州，使之来往辽东，传习汉语”。(《世宗实录》卷六十二，十五年)最后，世宗又改变主意，决定采取措施在司译院培养，“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途，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同上)“译语，十大先务，关系非轻。岁癸丑(作者注：宣德八年，1433年)世宗大王请遣子弟入学，未蒙准请。以所选入学文臣并衣冠子弟三十八为讲肄官，聚司译院习汉语，至今二十余年，译语精通者颇有之。……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世宗实录》二年四月条)世宗在晚年钤令出版了大量韵书，并翻译了大量中国书籍。1436年，世宗为研究汉语音韵，派遣汉学者前往辽东。汉学家申叔舟就是其中一人。申叔舟“奉命往辽东，与大明前翰林学士黄瓚，质问正韵，往还凡十三度。”(《东国輿地胜览》卷二十九)。“申文忠书舟与成三问承奉命学华语于辽东，一年三往。”(《通文馆志》卷八故事顶)1438年3月世宗命金何(曾到过辽东)三天一次给“世子”讲授汉语。(《世宗实录》卷八十，二十年)

1459年，世祖(1456—1468年)钤令大量出版了当时流传很广的汉语会话课本《朴通事》和《老乞大》。

成宗(1469—1494年)将擅长汉、日、女真等语的译人擢用于东西两班。对于这一措施，宫廷内议论纷纷，很多人持反对意见，说：“医译之流，皆出贱微，非士族也。”(《成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十三年)他们数天大闹朝廷，可是世宗始终没有改变这一既定措施。

清朝入关后，朝鲜显宗于1667年将女真学改为清学。清学(满语)是当时中国统治者的语言，但是朝鲜并没将清学作为四学之中心，而仍以汉学为四学的核心。

在译学中，汉学(有时叫汉文、汉音、汉语、汉川、中国言语、华言、华语等